

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

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

精华

南史

主编 廖盖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毛泽东读《南史》

记载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一百七十年史事的《南史》，是毛泽东生前非常喜欢阅读的一部史书，特别对《南史》卷十八《臧质传》、卷十九《谢灵运传》更是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，留下了诸多评点、批注。因为毛泽东对《南史》批注较多，所以没有批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宋书》。

《南史》，唐初史学家李延寿撰，共八十卷，包括本纪十卷，列传七十卷。起宋武帝永初元年（420），迄陈后主祯明二年（589），记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一百七十年史事。

《南史》的编纂是从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开始的，但未写完他就去世了。李延寿继承父亲的遗志，改父亲欲仿《吴越春秋》体例而为纪传体，合沈约《宋书》、萧子显的《南齐书》、唐姚察、姚思廉父子的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四书而为《南史》。

《南史》是李大师、李延寿父子两代，用了十多年的功夫，参阅了大量资料，进行严格增删修正而成的；编成后，又经著

名史学家令狐德莱亲自修改,质量是相当高的,是一部有价值的史书。

《南史》的篇幅比起南朝四部正史来要少得多。将《南史》与“四书”相对照,我们发现他删去了《宋书》中大量的夹叙文字,同时也删去了本纪中的诏册、让表等官样文章,每篇只留下一至二篇,对其他诏书、令制,也多作删削。在列传中,多删去词章作品、奏议文章,但意义较大的名篇,又全文照录。如《南史·陈伯之传》全文录载丘迟《与陈伯之书》、《任昉传》全文录载刘孝标《广绝交论》,等等。

李延寿将一大堆史料删烦去冗,编辑连缀,文字颇有条理,突出了纪、传的叙事部分,读起来更为清楚醒目。

梁武帝(464—549)萧衍,原为南北朝时期齐朝的雍州刺史,镇守襄阳。齐朝的东昏萧宝卷凶狂暴虐,杀死萧衍的哥哥萧懿,萧衍因而起兵攻占齐都建康,迎立萧宝融为帝,是为和帝。萧衍被封为梁王。后灭齐,建立梁朝。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乱的时代。在南朝,宋、齐、梁、陈几朝的频繁更替中,梁武帝执政48年,在位的时间最长。在位时,基本保持着和平环境,比较有作为。毛泽东在《南史·梁高祖本纪》中,有许多圈画和批注。梁武帝登位后,除军事、经济上有建树外,还“制造礼兵,敦崇儒雅”。但他“留心俎豆,忘情干戚,溺于释教,弛于刑典”,最后终因宗室子弟相互倾轧残杀,错误地接受北魏侯景的降服,引狼入室,导致梁室的覆灭。开国创业贵为





天子的梁武帝，竟卑微屈辱地饿死于侯景的囚室。李延寿说：“自古拨乱之君，固已多矣，其或树置失所，而以后嗣失之，未有自己而得，自己而丧。追踪徐偃之仁，以致穷门之酷，可为深痛，可为至诚乎。”徐偃是西周徐国国君，强大时有三十六国向他朝贡，被称为东方的霸主。毛泽东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，用红笔批注“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。”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185页）在“忘情于戚”“弛于刑典”两名旁画着密圈，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。在“未有自己而得，自己而丧。追踪徐偃之仁，以致穷门之酷”这几句旁，画着着重线。“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”，是唐朝诗人罗隐《筹笔驿》中的诗句。毛泽东随手拈来用以评价梁武帝，同样表达了他对梁武帝这个历史悲剧人物的感慨。

早期的梁武帝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，也很有魄力，毛泽东对此多有圈画。《南史·梁武帝纪》记载：当梁武帝的哥哥萧懿为齐所害，他起兵讨齐时，有人劝他把齐和帝接走，免得别人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自己被动。他不听，说：“若前途大事不捷，故自兰艾同焚；若功业克建，谁敢不从，岂是碌碌受人处分”。毛泽东在这段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圆圈，每句加了旁圈。梁武帝还清醒地觉察到齐朝的政权被某些地方官员所把持的弊端，他说：这些地方官员“皆口擅王言，权行国宪”，“而政出多门，乱其阶也”。毛泽东在前两句旁画着曲线，后两句旁画着密圈，在两处的天头上画着三个大圈，流露出赏识之情。



梁武帝很有军事才能,在《南史·梁高祖本纪》中,关于他善用兵的事例,多有记载。毛泽东在这些地方有不少圈画和批注,十分注意。

《南史·梁高祖本纪》记载:梁武帝在襄阳起兵时,齐派大军镇压。他派人离间齐军,说:“用兵之道,攻心为上,攻城次之;心战为上,兵战次之。”毛泽东在此处的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。梁武帝在争夺郢城的战斗中,及时在加湖打击齐的援军,梁“众军乘流齐进,鼓噪攻之”,很快取胜。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:“打援”。齐在援救郢城的同时,派人镇守江州,为之助威。梁武帝对诸将说:“夫征讨,未必实力,所听威声耳”。今加湖之败,谁不耷服。……我为九江,传檄可定也。”毛泽东在这段旁加了曲线。后郢城求降,镇守江州的陈伯之“犹惧”,“乃束甲请罪”,证实了梁武帝用兵的预见性和善于决策。

《南史·曹景宗传》记载:梁武帝天监五年(506),徐州刺史昌义之被魏军围困,梁武帝派曹景宗去解围,指令他在某地与另一援军会合后,共同行动。曹景宗想自己邀功,竟单独前进,却不料遇到暴雨,淹死不少人,只得退回。梁武帝得知这一消息后,说:“此所以破贼也。景宗不进,盖天意乎?若孤军独往,城不时立,必见狼狈。今得待军同进,始可大捷矣。”毛泽东对此加了旁圈,在天头上批注:“此时梁武,犹知军机。”

对梁武帝的知误和衰亡,毛泽东也有圈画和批注。梁武



帝的晚年，听不进正直的忠告。《南史·梁高祖本纪》记载：在他去世前五年，大臣贺琛针对时弊给他写了一个奏折，提出：官吏搜刮民脂民膏，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；上层统治阶层的生活穷奢极欲，浪费十分严重；权臣作威作福，专找别人的罪过；朝廷大兴土木，民众服役不得生养。建议他对官吏“宜严为禁制，导之以节俭，贬黜雕饰，纪奏浮华”。贺琛提出的这些情况本是实际存在的，建议也很中肯。但梁武帝对他秉公陈述的奏折却觉得忠言逆耳，根本听不进去，反而口授敕书，一一反驳，通加斥责。他说，我做皇帝40多年，一直能听取好的意见，最恨昏聩，你贺琛在朝为官，不应和地位低下、品格卑鄙的人一样讲话。毛泽东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：“此等语，与孙权诘陆逊语同。”孙权是三国时吴国的国君，陆逊是他手下继周瑜、鲁肃、吕蒙之后的得力名将，官至丞相。黄武五年（227），陆逊上书孙权，劝他“施德缓刑，宽赋息调”，孙权不接受，一一反驳。梁武帝和孙权一样，听不进正确意见。他用自己的简朴、勤于政事批驳贺琛说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加令不从。”又说：“我以身作则，不和女人同居已30多年，住处除一张床外，别无装饰摆设，不饮酒，不听音乐，不分昼夜，废寝忘食地处理国事，腰围都瘦了二尺，等等，这还不是起带头作用吗？毛泽东在这一段的天头上批注：“萧衍善援生，食不过量，中年以后不近女人。然予智自雄，小人目进，良佐自远，以致灭亡，不亦宜乎。”

梁武帝还斥责贺琛说：你说当今做官的都通过向皇帝奏事，谋求进取，但也不能因噎废食，不让他们这样做呀！否则岂不“专听生奸，独任成乱”吗？毛泽东在此处又批注：‘专听生奸，独任成乱’，梁武有焉。”毛泽东对梁武帝的批注大意是说“一个好皇帝，艰苦朴素、自善其身固然很难得，但若听不进好人的意见，不能兼听则明，那就会被小人所包围，导致失败，梁武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
“解汝南之围”。是指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七年(450)围攻汝南，宋守将陈宪告急，宋文帝派臧质去援救，杀伤魏兵惨重，魏太武帝败退。

“胜盱眙之失敌”。即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八年(451)率10万大军攻盱眙，臧质为辅国将军与之抗击。这一仗打得有声有色，充分显示了臧质的军事才能。委托太武帝向臧质要酒，臧质为羞辱他，把人尿装酒坛送去，魏太武帝大怒。毛泽东在“质封洩便与之”一名旁加了密圈，天头上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，批注：“此是欲战法，激之使战。”臧质给魏太武帝写信，辱骂他是自己来“送死”；又给魏军写信，说谁能斩了魏太武帝，“封万户侯，赐布帛各万匹”。气得魏太武帝做了一个铁床，装上铁铲，发誓一旦攻下盱眙，捉到臧质，定要将他铲死，碎尸万段。这次攻坚相持30多天，魏军屡攻不下，所施各种计谋都被臧质所破。最后魏军登城肉搏，“杀伤万计，死者与城平”。“太武乃解围而归”，损失超过一半人。臧质获胜。兵



法曰：怒不可以兴师，魏太武帝自取其败。以怒兴师，野战尚无胜算，况攻城乎？

“克刘劭之逆”。刘劭是宋文帝的长子，他昏庸残暴，杀了文帝自立为帝。臧质得到这个消息后，立即通知了文帝的第三子刘骏和江陵王刘义宣，并即日率 5000 人马去讨伐，生擒了刘劭，为孝武帝即位扫清了道路。臧质除掉无道昏君，立了一大功。

毛泽东所惋惜的历史上的“梁山之战”，是指孝武帝即位后，臧质因孝武帝年轻，许多事情都不向他请示和报告。臧质傲慢自负，“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”。又以为刘义宣更容易受他控制，因而阴谋推翻孝武帝，立刘义宣为帝。孝武帝得知这一情况后，派王玄谟等屯兵梁山洲两岸拒守。臧质向刘义宣献计说：如今应该派兵去打南州，王玄谟在梁山“必不敢轻动”。我乘船去攻占南京，这是取胜的最佳策略。有人劝阻刘义宣不要采纳这个意见，担心臧质取胜后野心更大，臧质的计划因而未被采纳。兵败，臧质逃回家乡，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，携带妻妾潜藏在一个湖中，追兵到，他用荷叶盖在头上用鼻孔出气，但最后终于被捕赐死。

毛泽东对臧质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褒中有贬，实事求是。毛泽东很欣赏臧质的军事才能，多所批注、圈画。对臧质向刘义宣的进计，逐字加了旁圈。对劝阻刘义宣反对臧质的话和臧质逃回家乡后的情况，也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。毛泽

东研究了梁山之战中臧质和刘义宣两人的作战部署，肯定臧质的意见，毛泽东认为，这一仗致败的原因不是臧质的无识无能，而是臧质的意见未被采纳，并为此发出“惜哉”的感叹。同时，毛泽东对臧质“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”处，用红铅笔画了着重线，并批注：“此是妄想”。《南史》作者李延寿在《臧质传》后有段评论，说：“……臧氏文义之美，传于累代。含文以致诛灭，好乱之所致乎”“含文”是臧质的字，“好乱”是指他不安分、有野心。毛泽东在“好乱之所致乎”旁，用红笔加了着重线，在着重线旁逐字画了六个大叉。毛泽东看重臧质在解汝南之围、胜盱眙之敌、克刘劭之逆等战役中表现的军事才能，因此他不能苟同史学家李延寿把梁山之战的失败，臧质被杀，归罪于臧质“好乱”这一论断。他以一个战略家的心态和感情，为臧质这一仗的失败表示惋惜，赞叹臧质为“豪杰之士”。

臧质豪杰之士

臧质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时人。少时爱好游猎，擅长赌博。曾任征北将军，车骑将军等职。后臧质图谋叛乱，失败而身亡。

毛泽东曾读《南史·臧质传》，对臧质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褒中有贬，实事求是。毛泽东很欣赏臧质的军事才能。



此是欲战法，激之使战。

臧质豪杰之士，一解汝南之围，二胜盱眙之敌，三克刘劭之逆。梁山之战，刘义宣不听臧质之言，因以致败，惜哉。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186、188页）

“进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”

据《南史》卷一九《谢灵运传》记载：

谢灵运(385—433)，晋宋间诗人。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)人，世居会稽(今浙江绍兴)。十八岁世袭祖父谢玄的爵位，世称谢康乐。刘宋代晋后，先后出任永嘉太守及临川内史等职。他为人豪奢放纵，不理政务，纵情山水，游娱欢宴。元嘉十年因谋反获罪被杀。

谢灵运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并且在艺术上卓有成就的作家。他善用富丽精致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，描绘山水美景，从题材上改变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，对南朝和唐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。但从全篇来看，并未脱尽玄言佛理的旧习，缺乏社会内容。遗有《谢康乐集》。

毛泽东曾读过《南史·谢灵运传》，对谢灵运这个人物颇感兴趣。他仔细阅读圈点了有关谢灵运及其家族的历史资料。他对谢灵运的生平事迹是了解的，由此才通过他的作品挖掘其内心世界。



毛泽东在谢灵运《登池上楼》这首诗中，有 100 多字的批语，远远超出作品本身，是对谢灵运一生政治态度和内心世界的客观评价。他批注道：

通篇矛盾。“进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”，见矛盾所在。

此人一辈子矛盾着。想做大官而不能，“进德智所拙”也。做林下封君，又不愿意。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。晚节造反，矛盾达于极点。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本自江海人，忠义感君子。”是造反的檄文。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 3 页）

池上楼在永嘉境内，《登池上楼》一诗是他任永嘉太守时所作。“进德智所拙，退耕力不任”，反映他当时郁郁不得志的心情，所以毛泽东说他“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。晚节造反，矛盾达于极点。”被毛泽东称为“造反檄文”的“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本自江海人，忠义感君子”一诗，是谢灵运谋反时写的一首诗，见于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，《古诗源》未收该诗，看来毛泽东是在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里读到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在谢诗中并不多见。当然，谢灵运的“造反”，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引起的铤而走险。毛泽东的批注，说他的矛盾是想做大官而不能，对他的政治作为并非持同情态度。但



对谢灵运的诗,毛泽东却颇为重视。在他写有批注的这本《古诗源》中,收进谢的诗有24首,毛泽东作了圈画的有22首。编者注释中,评论谢灵运的诗“一归自然”、“匠心独运”、“在新在俊”等处,毛泽东都画着曲线和圆圈。

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

韦睿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,在对魏作战中,屡立战功。他注重调查研究,善于抓时机,多次使用以少击众、以众击少的战略战术而取胜。魏国“众兵百万,连城四十余”,围攻北徐州。韦睿前往解围,他“夜掘长堑,树鹿角,截洲为城,比晓而营立”,又派人潜入城内使知援军已到,攻城时,他身先士卒,“飞矢雨集”而不避,大败魏军。韦睿不仅英勇多计谋,而且为人“雅有旷世之度,莅人以爱惠为本,所居必有政绩,将兵仁爱,士卒营幕未立,终不肯舍,井灶未成,亦不先食,……”。善于团结将帅,对部下“抚循其众,常如不及”。作风艰苦,“夜算军书,三更起,张灯达曙”。廉洁奉公,“所获军实,无所私焉”。“魏人服睿威名,望之不敢逼”。死后封为车骑将军。

毛泽东很爱读《南史·韦睿传》。《南史》卷五十八包括韦睿、裴邃二人的传,毛泽东在这卷开始的天头上,用粗重的笔迹划了四个圈,标写道:梁将韦睿、裴邃传。在《韦睿传》文内,更是密加圈点,批注有25处之多。



《南史》作者李延寿在记叙韦睿死时，对其生平行为特点有一段概括：“睿雅有旷世之度，莅人以爱惠为本，所居必有政绩。将兵仁爱，士卒营幕未立，终不肯舍，井灶未成，亦不先食。被服必于儒者，虽临阵交锋，常缓服乘舆，执竹如意以麾进止，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，余人莫及。”毛泽东很赞赏，批注说：我党干部要学韦睿作风。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204页）

那么，我们党的干部应该学习韦睿哪些方面的作风呢？从毛泽东的批注来看，主要是两个方面，一是他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果敢的无畏精神，一是他的仁厚的品格作风。

史家记叙韦睿督兵攻北魏小岨城时，韦睿环城巡视，魏城忽出数百人。阵于门外。睿欲击之，部下劝阻说：我们轻装前来，请回去披甲整装再来迎战。韦睿却说：魏城中只有2000余人，只能闭门坚守，这次无故出来几百人，定是骁勇善战之辈，我们如果能打败他们，城内魏兵便没有信心了，其城自拔。部下有些迟疑，韦睿便指着手里的令节说：朝廷把它交给我，不是装饰用的，我说的话不可违抗。于是部众听命进兵，魏军果然大败弃城。在这段叙述旁，毛泽东批注说：躬自调查研究，以众击少，机不可失，决心。

接着，史家又叙韦睿率军攻合肥，久未能下，韦睿又环城察看，决定先攻合肥东西两个小城，此时魏国派兵五万来援救，形成敌众我寡之势。部下要求增兵再战，或退守巢湖。韦



睿怒曰：“将军死绥，有前无却。”接着又令取来自己的旗帜立于阵前，以示无退兵之志，又亲自坐在板车上督战。夜间又张灯达曙，处理军务。终于攻战合肥。缴获一切，自己无所私占。读至此，毛泽东两次批注：以少击众，将在前线等等。

当史家叙韦睿会同曾景宗救钟离一事时，毛泽东又批注说：敢以数万敌百万，有刘秀、周瑜之风。

《韦睿传》载，韦睿“性慈爱，抚孤兄子过于己子，历官所得禄，皆散之亲故，家无余财。”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，批道：仁者必有勇。

在说到韦睿攻克合肥时，“所获军兵，无所私焉”。毛泽东又逐字旁圈，批道：不贪财。韦睿能周结部下，在胡景略和赵祖悦闹矛盾时，他亲自调解，晓以利害，避免了不利后果。毛泽东于此处批道：干部需和。说到韦睿治军，通宵达旦，操劳各种事宜，设立法度那段，毛泽东也是逐字旁圈，批道：劳谦君子。

在本传末尾，李延寿补叙了韦睿的几则轶事，以说明他深世人推重的为人风尚。在邵阳之战后，有次曹景宗与韦睿掷骰子赌输赢的游戏，韦睿赢了，却故意让给曾景宗。毛泽东批道：使曹景宗胜。本传又说：“曾景宗等在破敌之后，时常计较功劳，而韦睿却总是在后面。毛泽东又批道：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。韦睿的肚量和谦虚朴实，确实是值得学习的。

这些批语，涉及领导干部所应有的垂范、廉洁、勤政、团结

诸方面的作风素养，确实值得当今理政治军的干部学习。

《韦睿传》还说到韦睿的儿子韦放的事迹，毛泽东也批道：“韦放有父风。”

韦睿有古之儒将之风，有武人之胆略，有儒者之雅量。自古以来，但凡以文人掌兵者，莫不追求这种境界，但由于个人素质的差异，能近似者已稀，况如韦睿者乎？

袁凯无能袁粲死节

《南史》卷二十六《袁湛传》，同时列有袁湛的两个孙辈袁凯、袁粲的传记。袁氏是东晋的大族，与谢氏有通婚之好。袁凯和袁粲是堂兄弟。在刘宋朝均居高位。《袁凯传》说：袁凯“初为豫州主簿，累迁晋陵太守，袭南昌县五等子。大明末，拜侍中，领前军将军。时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，太子在东宫多过，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，从容言之。凯盛称太子好学，有日新之美。帝怒，振衣而入，凯亦厉色而出”。毛泽东读至此，批道：“袁凯无能”。这大概是指袁凯不善进谏。后袁凯起兵叛宋明帝，但他自己却“无将略，在军中未尝戎服，语不及战阵，唯赋诗谈议而已，不能抚接诸将。”乃至“未一战而败”，被杀。南朝名士，大率如此。不止无能，而是士风之使然。

毛泽东在《袁粲传》开头批注说：“袁粲死节”。袁粲有名士风度，宋明帝死前，托袁粲为顾命大臣，拥立宋后废帝。萧



道成杀后废帝，立宋明帝，又准备篡宋。当时袁粲任中书监，驻镇石头城（今南京清凉山），决意不事二姓，密谋进攻萧道成。事泄兵败。但他镇定自如，说：“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，但以名义至此耳。”遂被杀。

此种推论是错误的

孔琇之是南朝齐武帝时人，是宋武帝大臣孔靖的儿子。《南史》卷二十七《孔靖传》说他在当吴县县令时，不听人劝阻，把一个偷了邻家一捆稻子的 10 岁小孩送往衙狱治罪的事，其理由是“十岁便能为盗，长大何所不为？”就这样，传记作者还称赞他“有吏能”呢，毛泽东显然不同意史传作者的这个观点，他用红铅笔在“有吏能”几字下画了一条粗重线，在天头上批道：此种推论，今犹有之。如曰一人小而勿治，众人皆将效尤。（见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第 193 页）

在毛泽东看来，孔琇之治小孩罪的“推论”是没有道理的。人是随着环境、条件乃至年龄生长的变，化而变化的，环境、条件、年龄改变了，就不能排除这个小孩可以改正自己的偷窃行为。这就是他在读《后汉书》《陈寔传》写的批语里说的，“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”。如果像陈寔那样，对这个小孩进行教育诱导，变好的可能性更大。好借古鉴今的毛泽东特别感叹和忧虑的是，这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“推论”方法，在我人



的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。其表现的是：认为一个人犯了点小错误若不处理，大家就会效法他。毛泽东一贯主张：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，应采取批评教育从严，处理从宽，目的还是为了使之改过自新。所以，他经常讲，我们不要学鲁迅《阿 Q 正传》中的假洋鬼子，不准人家革命。他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中说得更明确：“人是要帮助的，没有儿子错误的人要帮助，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。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，多多少少要犯错误，犯了错误就要帮助。只看，是消极的，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。”因为，“对于革命来说，总是多一点人好。犯错误的人，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、屡教不改的以外，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。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，犯过错误的人，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，也可以少犯错误。”

毛泽东评点古人，联系实际，希望人们在对待人的问题上，要多点辩证法，少点形而上学。

曹景宗“亦豪杰哉”

曹景宗(457—508)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。他骁勇善战，立有战功，但在治军和个人品德上却又不为人称道。毛泽东说他“亦豪杰”，是指其骁勇洒脱的个性和率兵破敌的战功。

《南史》《曹景宗传》载：景宗幼善骑射，好打猎。有次随父出门，中途突然遇到数百个强盗围攻，他身上带有百余箭，百